

当代育人文丛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

王林生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

王林生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王林生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7

(当代育人文丛)

ISBN 7-80206-217-9

I. 中... II. 王... III. 经济社会:转型—理论思考—中国 IV. ①D920.4②0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821 号

当代育人文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

著 者: 王林生

责任编辑: 茹新平

封面设计: 心虹雨

责任校对: 张 韬

版式设计: 邱 惠

责任印制: 柴自邦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耀德装订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张: 50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217-9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代育人文丛》 编 委 会

主 任：卢继传

委 员：吴延浔 秦麟征 王肇庆
杨春敏 王长令 张 韬

主 编：王肇庆

序

王肇庆

一部人类文明史，既记述着科学技术创造的无数奇迹，也闪烁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熠熠光辉。“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共同构筑了人类文明的大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离不开科技进步。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神州六号、银河大型计算机这些科技成就我们许多人都可以如数家珍，近年来，“科教兴国”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相比之下，不少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追求实用的社会风气严重困扰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并非总能直接表现为经济指数。任何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有害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构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只有两轮齐转，协同前行，两翼共振，携手同飞，才能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动力。欧洲文艺复兴的光芒，既来自哥白尼、伽利略，也来自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铸就启蒙时期的辉煌的，既有牛顿、瓦特，也有卢梭、孟德斯鸠。1961年，前苏联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美国一些科学家认为，美国的科学技术高出苏联一大截，这个风头该由美国人来出。另一些美国人则清醒地指出，美

国的人文底蕴不如俄罗斯，缺乏由此带来的丰富想象力，所以应该服气。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反复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次繁荣发展，都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诸子百家和儒学兴起，才有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繁荣昌盛；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才有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2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才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航程；有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突破，才有了充满活力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才有了充满活力的改革发展新局面！

中国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自古就十分重视“人文化成”。在新世纪的宏伟事业中，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文明精华，是我们正确的抉择。自强不息的精神、厚德载物的襟怀、贵和尚中的理想、崇德尚义的观念、传统文化的人文之光烛照中华文明数千年，今天依然会给予阔步走向世界的我们以温暖和力量。

当前，我国进入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正化育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人文学苑，繁花似锦，人文百家，群星璀璨。为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决定在已经编辑出版《当代学人思想文库》、《当代学人求真文丛》的基础上，再编辑出版一套人文百家系列丛书。《当代育人文丛》即是这套系列丛书之一。

人文百家系列丛书以开放的视野、融汇人文学者研究成果中的华彩乐章。或以时间为序，或按学科分类，虽术业各有专攻，文风百家纷呈，但都学融文史经哲，识贯中外古今；思如大鹏飞

天，水击三千里；文如澄江秋月，境界自有高格，一卷在手，可含英咀华，探无穷意蕴；一套置案，如群山连绵，遍览百家，彰显人文学苑无限风光。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全体同仁将继续和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主动承担起繁荣发展人文科学的历史使命。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内涵，新的生命。让人文之光照亮发展中国，创造我们更加和谐、幸福、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

前 言

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

改革创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逐步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学者在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现代博弈论等社会科学理论,是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

这几年,我阅读了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大量著作,喜欢用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本书收进的30篇论文,就是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成果。这些文章写于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攻坚”阶段,也是制度创新的阶段。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变动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尖锐。我在广州就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的“阵痛”与兴奋!因而所关注的问题大多是社会的热点难点。诸如,公有制改革、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政府职能、思想政治工作、社会道德、价值观等,都在我的文章中得到回应,有些观点还留下了很深的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思想的“痕迹”。

一位哲人说过,感受来自现实,它永远是鲜活的。我写的东西,也是来自对现实的感受,没有感受,我是不会动笔的。然而,仅有感性认识是不够的,必须用理论去分析和解释现实。于是,我尝

试用社会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曾经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有人害怕产权转让会使国有资产流失。然而在国有产权没有转让之前,为什么人们却不关心它?这个问题有点像产权经济学中的“阿尔钦之谜”。阿尔钦在讨论产权问题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私人所有的剧院与公共所有的礼堂,同时以赚钱为业(收门票),共同服务于这个小镇 1000 人口。给定以上社会安排,阿尔钦进一步问,二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认定前者是私有财产,后者是公有财产?其实这个“谜”并不难解。早在 2000 年前,古希腊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就悟出了这个道理。他说:“为许多人所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所有的东西的关注均大于与其他人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从这句话中我们似乎找到了“阿尔钦之谜”的谜底,也就是说,认定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主要看个人对财产的关注值。当个人与财产的联系越紧,其关心值越高;当个人与财产的疏离越远,其关心值越低。由此来看,显然关心值高的是私有财产,关心值低的则是公有财产。过去人们不关心国有企业,说明国有财产与个人关系不大,这证明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基于这种认识,我写了《分清所有制与所有权是迈出产权革命的关键一步》、《产权制度在人防地下工程建设上的一次创新》等文章,不仅主张国有产权转让,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突破。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一个难解难分的问题。著名的“诺思悖论”说的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诺思看来,政府是一把双刃剑,没有政府办不成事,但有了政府又有很多麻烦。政府是产权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但又是产权的侵害者。他对政府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本人对长堤风貌街“休克”案和红星村党政争权案的分析,都与地方政府有关。前者反映了政府“错位”,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是对私人产权的侵害;后者反映了政府“缺位”,政府该做的没有做,没有及时提供村级制

度安排。这两个案例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政府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当我们注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是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一方面是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不断下降。为什么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时忽视了自身的道德情操？这是我长久思考的一个问题。自从自由经济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来，有人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看成是“斯密悖论”，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不讲道德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人是不讲个人利益的。我认为这种看法并非斯密的真实意思。恰恰相反，斯密假设的经济人是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经济人。所谓理性的经济人，是指在已有的法律、制度、道德约束的条件下选择最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所以，经济人在交易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利益，只有当对方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都能实现时，交易才能成功。实际上，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为理性的经济人而写的，他揭示了财富增长与道德约束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后来萨缪尔森对如何理解幸福时给出一个公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体现的思想内涵也暗含了斯密的思想。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越大而获得的效用相对较低，那么这个人的幸福指数就越低。从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在追求幸福时必须对自己的欲望有所约束。这一点对我们认识中国问题启发很大。我写的《论诚信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声誉：社会自治的重要机制》等文章，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诚信、声誉，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且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

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需要寻求与他人的合作，但合作中又存在着冲突。如何认识和解决合作与冲突的问题？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领导能力的一个巨大挑战！多年来我们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关系，的确

遭遇了社会管理的“两难困境”，即横向的集权与分权的困境和纵向的激励与可信承诺的困境。“两难困境”的背后实质是个人与社会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团队中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一社会管理两难困境是管理问题的核心。我在撰写《重复博弈的合作与领导能力》一文时，针对管理中的集权与分权，独裁与民主、激励与可信承诺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目的是通过构建一个分析管理困境的合作理论框架，引导人们走出社会管理困境。

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终极理想和崇高目标，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寻求社会治理的“良方妙策”。同样的，这一崇高目标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在思考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时，深感人类社会将长期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自身发展的关系。这三大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将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的和谐状态。当人们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感到欢欣鼓舞时，我却对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深感忧虑。《西关文化与广州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高境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价值》、《共产党员素质的构成与提升》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对和谐社会的认识，特别是站在和谐的高度，强调了“天人合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升人的自身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生的问题，不是这几篇小文章就能说清楚的。我深知自己的认识能力有限，虽然斗胆去写这些重大问题，但只是触及问题的“皮毛”而已。

王林生

2007.6.23

写于广州白云山盈祥居

目 录

分清所有制与所有权是迈出产权革命的关键一步	1
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外部性关键在制度创新	12
用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26
坚持制度创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	35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密切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41
西关文化与广州可持续发展	47
强化政府在有效治理中的制度供给	54
扩大社会自治治理的范围	61
完善政府决策规则与实施机制	69
谁来监管村集体资产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村案例分析	76
政府的手是怎样拧伤市场的腿	
——政府错位导致长堤风貌街“休克”的案例研究	83
对继续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一点看法	94
中国私人企业如何参与公共服务	95
广州自然垄断性行业协会生成与发展的机理分析	
——以市政园林局五大行业协会为例	107
探求旧城改造新思路 奠定荔湾发展新基础	114

产权制度在人防地下工程建设上的一次创新	120
试论领导思想对决策的影响	123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关键是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132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 用求真务实的人才	135
论诚信的价值观	140
声誉：社会自治的重要机制	146
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价值	152
和谐社会 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高境界	16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共产党员的价值观	163
共产党员素质的构成与提升	170
排头兵：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179
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181
向信息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188
构筑城乡一体化信息网络	194
重复博弈的合作与领导能力	
——一个分析管理困境的合作理论框架	203

分清所有制与所有权 是迈出产权革命的关键一步

我国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产权革命。因而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然而也有人担心国有产权的改革，会动摇公有制这个主体地位。动摇公有制也就意味着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根基。这种把所有制与所有权看成不能分离的观点，不仅混淆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概念，而且将给产权制度改革人为地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分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区别，从而真正地使产权者作为主体进入市场。本文将舍弃产权制度改革一般思路的探讨，而着重讨论如何认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问题。

一、所有制只是所有权的外在形式

什么是所有制？所有制同所有权有没有区别？过去我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以致我们常常把这二者混为一谈。

让我们先看看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知道，人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集团、个人所有的。一般来说，谁拥有某种财产，同时谁也就有了对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如果社会财富普遍属于私人所有，那么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私有制社会；如果社会财富普遍属于国家、集团所有，那么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公有制社会。从这一点看，所有制是相对所有权而言的。有什么样的所有权就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假若这个企业是国家所有的，那么它就是国有制企业；假若这个企业是由若干股份

组成的，那么它就是股份制企业；假若这个企业的资产，既有国家的又有外国的还有私人的，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可以认为，所有制是人们对产权性质的普遍现象的一种抽象概括，它只是产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只是产权的名称。

所有制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简单地把不同产权的所有制，概括为私有制与公有制，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科学。实际上所有制形式不仅多样化，而且各种所有制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跨国所有制，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这些所有制由于产权的变动而正在发生变化。即使是传统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扩大。任何一种所有制的产生与变化，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由于生产力具有多层次结构，因而投入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资产也具有多层次结构，这就为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作为代表各种所有权的所有制的出现与变化，也就有其客观必然性。既然各种所有制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相适应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定哪种所有制优越，哪种所有制落后。只要它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我们就应该允许其存在与发展。所以，所有制不存在优劣问题。

过去我们对所有制的认识是不科学的，尤其对公有制的认识是模糊的。人们常常把公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国有制等同起来；把私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等同起来，以致造成社会的习惯看法。公有制，泛指公共所有，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产权的公共所有（讲到产权排他性时再说），即使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产权也不是人人都有权利支配它。过去人们习惯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实际上也是空洞的。就说国有企业的财产吧，不要说其他国有企业不能支配另一个国有企业的财产，就连本企业的职工也无权支配所在企业的财产，这样的公共所有权又从何体现呢？所以，由公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 是一种抽象的空泛的所有制。这样讲无意否定公有制形式的存在, 而是想指出像这样的公有制只是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理想化了的所有制。实际上公有制不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 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公有制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直到现在公有制仍在发展。但现在对公有制的认识已不同于原先对那种全民所有制的认识。应当承认, 公有制是相对私有制而言的, 现代公有制的组织形式远非过去那种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公有制还应当包括集体所有制、股份制、合作制、以及跨国所有制。如果我们局限于国有制就是公有制的认识, 那么就必然产生改革国有制就是动摇公有制的认识, 这种认识既会阻碍国有企业的改革, 又会阻碍公有制的发展。

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它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人类历史表明,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迟早会引起所有制的变革。马克思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 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 (公共所有) 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 (社会所有制) 比较起来, 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2 页) 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概念中的“社会”是指什么? 他在论述股份公司时曾对在“私人”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一词的涵义有明确提示。他写道: “股份公司的成立, 由此……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 在这里取得了社会资本 (即那些

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的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很明白,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按照这个提示,“社会”就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那么可以说,社会所有就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显然,我们所理解的原先公有制的概念,与马克思明确界定的社会所有制概念是不同的。我们讲的公有制一般指全民所有制,而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是指“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于光远在1993年7月21日“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认为:“把‘私有’理解为‘分散的个人所有’而联合起来以后就不存在‘私有’了,但是‘个人所有’在联合起来以后还是‘个人所有’。”按这种理解,个人的资本只要联合起来投资,就转化为社会资本,它所投资的企业就不属于个人的企业,而是属于社会的企业,随之个人的所有制也就转化为社会所有制了。但是,个人的所有权并没有被剥夺,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仍然是“个人所有”,只不过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分散的个人所有”,而是社会所有了。

通过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关心的是所有权而非所有制。因为所有制只是所有权的一种外在形式。不论公有制也好,还是私有制也好,它与集团、个人的利益并不直接。而所有权不同,它直接关系到集团、个人是否有权占有、使用各种资源。谁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谁就能获得直接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谈论产权要比谈论所有制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改变某种所有制结构,并不等于改变某种所有权。一个国家以哪种所有制为主或为辅,不是主观确定,而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中一种选择与认同。所以,我们在产权制度改革中,不必为所有制问题而困扰,